



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

論文集

視域交會中的儒學

近代的發展

楊貞德 主編



中央研究院

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視域交會中的儒學

近代的發展

楊貞德 主編

中央研究院

視域交會中的儒學：近代的發展 / 楊貞德主編. -- 臺北市：中央研究院，2013, 11

面；公分. -- (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第四屆)

ISBN 978-986-03-8903-6 (精裝)

1. 儒學 2. 文集

030.8

102023143

中央研究院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視域交會中的儒學：近代的發展

有著作權，侵害必究

發行人：翁啟惠

總編輯：黃進興

主編：楊貞德

執行編輯：吳曉昀

出版發行：中央研究院

印刷者：大光華印務部

總經銷：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定價：新台幣 400 元

出版日期：2013 年 11 月

GPN 1010202656 ISBN 978-986-03-8903-6 (精)

本刊不負責來稿內容物之版權問題，由作者自負文責。

Papers from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CONFUCIANISM IN INTER-CULTURAL
PERSPECTIVES:
MODERN DEVELOPMENTS**

Edited by Yang Chen-te

Academia Sinica

開幕致詞

大會主席 余英時院士

中央研究院第一次召開國際漢學會議是在一九八〇年，原本希望以後每十年召開一次。今年是第四屆，但距第三屆已十二年，算是遲了兩年。

事實上，早在一九五九年已有人提議本院應該召開漢學會議。當時的院長是胡適之先生，他認為臺灣的漢學研究無論在質還是在量的方面都還沒有達到他所期待的水平，因此力主緩議。這一提議卻引起了她對於所謂「漢學中心」的記憶和感慨。他說：

二十年前在北平和沈兼士、陳援庵兩位談起將來漢學中心的地方，究竟是在中國的北平，還是在日本的京都，還是在法國的巴黎？現在法國的伯希和等老輩都去世了，而日本一班漢學家現在連唐、宋沒有標點的文章，往往句讀也被他們讀破了。所以希望漢學中心現在是在臺灣，將來仍在大陸。

但六十三年後的今天，我們對於胡先生的「漢學中心」說已有完全不同的理解。試一回顧過去五、六十年間漢學的發展，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兩點認識：

第一，漢學已加速度地擴散到一切專門學科之中，不但人文和社會科學的每一部門中都包涵著越來越多的漢學研究，而且在中國科技史的廣大領域中，自然科學的各部門也和漢學日益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了。於是出現了一個奇詭的景象：漢學一望無際，觸處皆是，但是漢學作為一個專門學

科 (academic discipline) 卻並不獨立存在，因為漢學研究基本是寄托在其他學科之中的，如語言、文學、歷史、哲學、藝術、宗教之類。

第二，二戰以後各國漢學研究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可是「漢學中心」卻未在任何地方出現。不用說，漢學研究在各國活躍的情形頗不一致，但即使是最活躍的國家也未曾取得公認的「中心」地位。事實上，如果我們分別考察各國漢學研究的大體趨向，便不難發現：主要由於研究的傳統和關注的問題彼此不同，每一地區的漢學都或多或少地展現出一種獨特的歷史和文化風貌。世界文化是多元的，漢學研究的傳統也不能不是多元的，這是我們今天共同承認的基本事實。

基於以上兩點新認識，我們可以十分肯定地說，胡適和他的朋友們當年最所縈心的「漢學中心」何在的問題，今天已自然而然地消逝了。如果有人堅持要在這個問題上討一個明確的答案，我祇好說：漢學猶如十六世紀布魯諾 (Giordano Bruno) 構想中的宇宙，其中心無所不在，其邊緣則無所在 ("Its center is everywhere, its periphery nowhere.")。

自本院一九八〇年召開第一次會議起，我個人每一屆都曾參與準備工作。因此我可以很負責地說，我們的唯一目的便是給世界各地漢學研究者提供一個充分交流的學術平臺，所謂「漢學中心」問題從來不在我們的考慮之內。我們承認並且尊重每一地區漢學傳統的獨特風格，但是我卻不願看到任何漢學研究社群走上自我封閉的道路。因此不同傳統之間的互相溝通、互相認識和互相影響是極其必要的。我們相信，過去本院主持的三次會議多少曾發揮了這樣的功能。我們希望本屆會議也能作出同樣的貢獻。

我以最誠摯的心情感謝各地漢學同道們前來參加會議，特別是遠道冒暑而至的朋友們。我預祝大家有一次成功而愉快的學術聚會。

我個人因事不能到會，謹致最深的歉意！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日

序

中央研究院副院長 王汎森

中央研究院在一九八〇年舉辦了第一屆國際漢學會議，其後以約十年的間隔舉辦一屆，至今已屆第四屆。二〇一〇年初我奉翁啟惠院長的任命，擔任副院長一職，當時思考著幾件應該進行的大事，其中之一就是漢學會議。在翁院長的大力支持下，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順利召開，上距第三屆已有十二年，而距離第一屆更超過三十年。三十多年來，與會的學者在改變，討論和關注的議題也隨著時空的推移，不斷的變遷。

當代社會資訊發達，空間距離縮小，連帶促進了地球村的形成，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使得「漢學」已不再是專屬華人的學問，而儼然成為國際性的議題。學者關心的議題，也不再限於一時一地，而更多跨領域甚至跨國界的觀照。

從這一屆所發表的論文觀察，我感到較諸以往有幾點不同。在這裏僅以史學為例，從「主題」、「材料」與「工具」三方面略作討論。

首先是「主題」的擴展，以歷史研究為例，早已跨出傳統「帝王家譜」的框架，進而更多關注基層社會的歷史，關心人民的生活。討論的議題幾乎可說已經沒有局限而充分展現多元。

從「史料」方面講，傅斯年所揭示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的精神，繼續得到重視與發揚。尤其近年來大量新材料的出土，大幅改變了我們對問題的看法和認識。這裏所說的新材料，不只限於考古出土的史料，還應該包括過去被列為禁燬或長期處於邊緣的史料，這些以往不能看或不易看到的東西，經過大量的刊印後，如今都觸手可及，無異於「新出土」，提供給學者們一個研究的新寶庫。此外，許多數位化資料庫

的建立，使得過去數十年皓首窮經都做不到的事情，現在也許一個按鍵彈指間就可獲得，為學者帶來無窮的「近用性」。當然，我也必須強調，「檢索」不能代替閱讀。

從「工具」而言，科技帶來許多研究的新工具，數位工具的興起，使研究者與材料之間的關係得到全面的改變。另外如 GIS 的應用，方便我們用空間來思考事情，也使得研究的面向從單點連結到多點、甚至擴展為全面。這些新工具的產生及應用，是過去幾屆漢學會議所無法想像的事。當然，以現代科技的日新月異，我們可以想像到第五屆時必然會有更新的工具出現，其新異的程度也可能是我們現在無法想像的。

第四屆漢學會議的成功召開，首先要感謝翁啟惠院長的全力支持，余英時院士慨允擔任大會主席，黃進興院士和黃樹民院士力任艱巨。世界各地學者的熱烈響應，更是我們必須表示敬意與謝意的。

在會議召開一年後，全帙二十二冊的會議論文集得以出版，這要歸功於出版委員會的不懈努力以及李宗焜博士、葉光輝博士與各冊主編和學者專家的配合。不論會議期間或出版過程，還有無數的助理同仁都付出了大量的心力。在全書即將付梓之際，我謹代表中央研究院對他們的貢獻表示衷心的感謝。

序

大會祕書處

二〇一〇年四月，翁啟惠院長由於關切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特別指示，籌辦「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歷史語言研究所會同民族學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中國文哲研究所、臺灣史研究所、語言學研究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等七個研究單位，共同配合辦理。經過整整兩年的努力，遂於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如期召開大會。各國應邀發表論文的學者共計有二百九十二位，主持與評論者計四十三人，全體與會人員更達一千六百之眾，堪稱學術界的一大盛事。

本次會議具有四大特色：首先，進行深度討論，會議論文發表者，兼做主持人與評論，角色彼此替換；其二，跨學科、跨領域、跨地區的探討；其三，新領域與新議題的開發與探索；最後，迥異於往昔只有資深學人參加，此次廣邀富有潛力的年輕學者與會，副教授以下達總人數四分之一以上。

會議期間，雖值颱風侵襲，與會人員一本初衷，風雨無阻，踴躍出席，討論熱烈，成果甚為豐碩。會後，復承王汎森副院長交待，成立編輯委員會，審議提交論文，俾便結集成冊。茲將最後定稿梓行，以供學界分享，並就教於諸方大家。

最後，本會議論文集得以刊行，必須感謝各分冊主編，尤其是出版委員會的編輯祕書李宗焜教授。

謹列本屆國際漢學會議攸關工作人員如下，並致謝忱：

主席兼召集人 余英時（中央研究院院士）

祕書長兼副召集人 黃進興（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副祕書長 黃樹民（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執行祕書 林富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籌備委員（依姓名筆畫順序）

胡曉真（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陳恭平（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黃克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鄭秋豫（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謝國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顧問（依姓名筆畫順序）

丁邦新（中央研究院院士）

王賡武（中央研究院院士、新加坡國立大學）

李亦園（中央研究院院士）

李歐梵（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學）

杜正勝（中央研究院院士）

杜維明（美國國家藝術與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

郝延平（中央研究院院士）

張玉法（中央研究院院士）

梁其姿（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

莊炳煌（中央研究院院士、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許文雄（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

許倬雲（中央研究院院士）

楊國樞（中央研究院院士）

葉文心（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目次

余英時	開幕致詞.....	i
王汎森	序.....	iii
大會秘書處	序.....	v
楊貞德	導言.....	1
程艾藍 Anne Cheng		
	「漢學」：法國之發明？.....	15
Gregor Paul		
	Confucian Universalism as a Driving Force of Humanity: The Timeless Lesson of Japanese Confucianism.....	43
陶德民		
	內藤湖南晚年的東方回歸及其含意： 從《新支那論》到東方文化聯盟.....	59
陳來		
	梁啟超的「私德」論及其儒學特質.....	85

楊貞德

人心、制度與歷史：張君勱的憲政思維及其意涵133

吳汝鈞

牟宗三的存有論的知識論197

何信全

牟宗三哲學中的道德主體：一種康德式的自我觀？ ...255

Heiner Roetz 羅哲海

A Comment on Pragmatism in Chinese Studies279

《視域交會中的儒學：近代的發展》

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年

導 言

楊貞德*

儒學在近代世界（特別是近代中國）經歷了從興盛到挫敗的慘痛過程，及至二十世紀末期逐漸出現的復興跡象，是否意味著儒學終將再起，即使無法成為政治、社會與文化的主導力量，也能在當代扮演正面、積極、甚至於關鍵性角色？這些問題涉及的不僅是儒學思想內涵的不同詮釋和發展，也是外在政治、社會、文化和學術環境的變化。從這一角度看，重新檢討儒學在近代所需面對的問題和因應的方式，無論就學術與現實、或就回顧過去與展望未來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為了能夠更深入思索和回答這一問題，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於二〇一二年由院方舉辦的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中，邀約了來自各方的學者，共同討論儒學在近代中外思想交流中的面貌及其歷史和現代意義。今將會後經由審查和修訂所得的成果以「視域交會中的儒學：近代的發展」為名，結集成本書。書中共收入八篇論文，分別說明在十六世紀末以降的歐洲漢學、十七世紀到二十世紀日本和中國의思想和學術，以及今日美國實用主義研究中，儒學以不同的性質和形式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意涵。這些論文共同呈現出的既是歷史人物和當代學術在不同視角交會下所見的儒學，也是研究者所採取檢視這些議題的不同取徑，和對於儒學所作不同評價的交會。文中討論既相關於儒學的宗教性、哲學性、普世性、政治性和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開放性等等具有當代意義且引發諸多爭辯的議題，也發掘出儒學前此未見或忽視的特徵、問題性與潛力。

—

本書第一篇論文〈「漢學」：法國之發明？〉，由法國法蘭西學院 (Collège de France) 的程艾藍 (Anne Cheng) 先生撰稿，旨在檢視漢學於歐洲（特別是法國）的特色和轉變。「漢學」一詞隨著空間和時間的變化，寓有不同的內容；從空間看，有歐洲漢學、美國漢學、東亞漢學，以及所謂的「域外漢學」和「新漢學」等等說法；它們彼此之間有所區分、也有所融通。就時間看，則漢學整體或者各地區或型態的漢學自有其內在的演變，既有斷裂、也有繼承。程先生的文章從十六世紀末（約當明代晚期）耶穌會士將儒學帶入歐洲談起，之後即分就啟蒙時期和後啟蒙的孔子（經常也被等同為中國）的形象和地位，梳理其中的變化。

根據文中討論，耶穌會士、啟蒙時期的哲人與其後以哲學為專業的思想家，這些不同世代的歐洲學者，雖然並非全然臆造儒學的內容，卻也根據他們的目的和疑慮，對於儒學作了選擇性、並且可能自相矛盾的聯想和詮釋。這些聯想和詮釋意涵的不僅是從不同角度揭示儒家思想的內涵、也是站在不同立場挑戰詮釋者原有信念的可能性。舉例來說，耶穌會士藉由比附儒學於基督教義，為儒學在歐洲思想中營造出正面的形象；但是，他們在說明儒家藉由「自然啟示」而獲得與基督教義相趨合的道德主張的同時，開啟了另一道門，使得道德可以獨立於宗教（神意與神學），孔子得以成為挑戰宗教的助力。十八世紀時，伏爾泰 (Voltaire, 1694-1778) 即以孔子和中國為理性、智慧、寬容等理想的化身，並引為抨擊政治和宗教現狀的武器。但也約在這時，盛行一時的中國熱開始冷卻。孟德斯鳩 (Charles de Montesquieu, 1689-1755) 等人同樣重視經驗和理性，所見的儒學和中國卻

是專制的體現。及至於十九世紀，經歷過蘇格蘭啟蒙運動、殖民主義、民族主義，以及哲學進入大學學科化的發展，歐洲反中國的聲浪全然顛覆了前此哲學中國的意象。這時，德法兩國的大學另以古希臘為理性的典範，強調人的思辯能力和意義，而且據以否定儒學的哲學性、甚者視之為低層級的宗教。影響所及，漢學在法國即被排除在哲學之外，成為另一個研究的領域。

如同先生所強調，儒學西傳歐陸的變化，正是中國在西方思想和歷史中從具有共同傾向和理想的夥伴，轉成為遭到鄙視、甚至於仇視的「他者」的過程。文中反映出的固然不無儒學文本中多義的可能性，更明顯而具關鍵性的卻是西方自身的需要和詮釋眼界的變化。程先生在文中明白標誌出西方在不同時期據以評價儒學標準的「宗教」和「理性」等概念所蘊涵的內容具有不同的意義，並提及若干迄今仍然引起爭辯或者猶未完全消弭的問題。後者包含：中國究竟有沒有哲學？即使佛學和老莊是哲學，儒學是否也能並列？漢語結構是否不適於哲學的思考？黃種人是否不如白種人？至於晚近由中國興起所帶動的新的政治和學術形勢，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將如何影響漢學，程先生在文末提出這一問題，並期許它為漢學研究帶來真正的革新。

如果說儒學在歐洲地位的殞落過程，相形於對它所具有普世性意義的質疑，本書所收入的第二和第三兩篇論文分別觀察西方衝擊前後的日本思想，其結論合而觀之也顯示出儒學從興盛到衰亡的趨勢。不同的是，在十九世紀以降西方帝國主義擴張所導致東西文化對立的情況下，儒學在日本所處地位的變化，明白揭示出儒學在近代普世主義和民族主義糾結中的另一種難局。

第二篇論文由來自德國卡爾斯魯厄理工學院 (Karlsruh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的 Gregor Paul 先生以「Confucian Universalism as a Driving Force of Humanity: The Timeless Lesson of Japanese Confucianism」為主題，討論十七世紀以降日本思想界所見儒學中亙古常新的普世意義。儒學是否

具有現代意義，是否如同現代思潮般肯定個人的道德自主 (moral autonomy) 與人的尊嚴 (human dignity)？指出儒學中具有這些現代的理念，是否就是西方中心論？有鑑於學界對此已有不少討論和爭辯，先生取日本思想史上所見的孟子天爵理念和誅一夫論，回應對於儒學（在此意指《論語》、《孟子》和《荀子》）具有現代意義的質疑。文中首先表明：日本確曾接納孟子的倫理和政治觀；大化革新 (645-646)、大鹽平八郎 (1793-1837) 與古學派的伊藤仁齋 (1627-1705) 在採取激進的行動和思想時，都訴諸儒家的天命觀和除暴君論，明治時期「明六社」也以孟子的倫理觀作為人權理念的基礎。只是，堅持儒學乃是外來、非日本的聲音也很大，並且成為日本沙文主義、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的基礎。

接著，先生專注於回答下列問題：援引康德 (Immanuel Kant, 1724-1804) 來說明儒學的內涵，這一作法是否為歐洲中心論的反映？根據文中所述，將孟子類比於康德，並不代表孟子是個康德式思想家，而是說如果道德自主的意義在於服膺普世的道德原則，則孟子主張誅一夫必須以從道、行仁義為前提的作法，正有如康德所說的道德自主意味著服從普世的道德律法一般。此外，孟子以天爵彰顯人的尊嚴、堅持個人尊嚴高於其性命和生存等等立場，也都證明他具有道德自主的理念。事實上，不僅當今西方出現如此看待孟子的主張，全然未受歐洲影響的日本歷史人物不分學派也有同樣的看法，只是對於孟子思想有不同的評價。例如：挑戰現狀的古學者伊藤仁齋表示：「為天下除殘謂之仁」，並非出自「一人之私情」；支持天皇制的國學者，荷田春滿 (1669-1736) 認為孟子的天命說及其政治革命論毫無道理可言，本居宣長 (1730-1801) 則抨擊孟子的主張是個人主義、唯我主義和任性而為。在伊藤等人看來，孟子的說法具有普世性意義，並非因為它是儒學，而是因為個人能夠以理性和互為主體的論述捍衛它，不受人時地的限制。

繼前述兩篇論文以比較宏觀的視野，勾勒出歐洲的漢學演變和日本對於孟子的理解之後，本書所收入的其他論文另以微觀的分析，分就個別

歷史人物或學術研究，討論儒學在近代日本、中國和美國思想界或學術界的地位。第三篇論文由日本關西大學陶德民先生以「內藤湖南晚年的東方回歸及其含意：從《新支那論》到東方文化聯盟」為題，闡述內藤湖南(1866-1934)於一九二四年回歸東方的轉變及其背後的意義。內藤原為雜誌編輯兼記者，之後專注於中國研究，並於一九〇七年開始任教於京都大學，提出深具影響力和爭議性的「唐宋變革說」。根據陶先生的說明，內藤盱衡國際現勢，於一九二四年出版《新支那論》一書，向排日的中國人提出「東洋文化中心移動」說，一方面承認日本接受了中國文化，另方面則宣稱文化的花朵會在原有的中心枯竭時綻放於邊境，中國文化的中心將移往日本。一九二六年，內藤以〈關於民族的文化與文明〉一文挑戰歐美國文明，並聲稱東洋(尤其是中日)的文化生活早已進至生活趣味和藝術的關注，遠非仍以利用厚生為生活目標的歐美所及。一九三一年，內藤再發表〈關於東方文化聯盟之鄙見〉，抨擊近代西方的政治經濟組織，並舉列中國、印度、日本和滿州回教徒的傳統生活方式，作為另謀出路的參考。

陶先生在文中對於內藤有關國際和日本政治經濟的觀察多所著墨，雖然並未詳加分析內藤的儒學或中國觀，卻已清楚透露出儒學在原來深受其影響的東亞，因為民族主義的興起而面臨的困境。在救亡圖存的抉擇和富國強兵的追求中，儒學如何能與兼具威脅和吸引力的西學相抗衡！儒學、西學和在地的民族特徵，三者之間何者為要？以日本為例，內藤儘管到了晚年主張從西學回歸東方，他所關切和肯定的實為日本作為民族國家的命運，特別是日本在亞洲政治、經濟和文化各方面的領導地位；他的「東洋文化中心移動」說，很容易就可以脫離其原有支持中國文化的脈絡。另就本書並未納入討論的韓國或越南而言，帶著普世性色彩的儒學，儘管過去備受尊崇，在今日帶著深厚反殖民主義的民族感情糾結中，如何可能不被視為必須排除的「他者」，也是難解的問題。